

從宏觀角度探討生活質量——對中國大陸 幸福指數相關研究的總結與反思

邢占軍*

摘 要

自上世紀 50 年代中期開始，宏觀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在西方興起並逐漸進入決策者視野。8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研究者開始從宏觀層面探討生活質量。進入新世紀、特別是 2006 年以來，大陸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進入新的階段，幸福指數逐漸成爲學界、媒體和各級決策者關注的熱點。本文在系統考察中國大陸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的基礎上，對幸福指數相關研究進行系統的梳理與反思，探討幸福指數的含義、研究價值、測量方法和政策功能，思考當前和今後該研究領域有待關注的一些問題。

關鍵詞：生活質量、幸福指數、幸福感、公共政策

*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 2006 年以來，「幸福指數」(well-being index) 引起了大陸學界、媒體、決策面和公眾的廣泛關注。一些媒體不斷地拋出有關幸福指數的話題，不同層面的決策者對幸福指數普遍給予了相當積極的回應，公眾則通過各種媒介特別是互聯網表達著對幸福指數的複雜心態。來自社會的各種不同反應極大地推動了學界對幸福指數的研究。從學界來看，儘管幸福指數在大陸看似一個新的話題，其實大陸學者對與之相關問題的研究卻已走過了 30 多年的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的研究，幾乎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相伴而行，只不過在不同階段其對決策面的影響程度不同而已。到了今天，隨著中國大陸邁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定位需要進行新的調整，幸福指數的價值和意義越發凸顯。本研究擬在系統梳理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幸福指數的含義、研究價值、構建方法和政策功能等基礎問題，並對今後幸福指數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問題加以思考。

一、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研究 30 年的歷程

在考察大陸幸福指數研究歷程之前，首先要對作為討論前提的相關議題加以限定。對於幸福的科學研究，大致有兩種研究視角，一種是從個體微觀角度出發，主要為臨床心理、工商管理、社會工作以及教育管理等相關領域研究者所關注。這類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提升針對個人或群體的心理治療、心理輔導、組織管理水準，以幫助個體更好地康復、更好地適應社會、更幸福地工作和生活。另一種視角則基於社會宏觀的角度，研究者主要來自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和公共管理學等領域。這類研究所針對的是社會發展的目標導向以及對特定社會進步與發展狀況的評價，其目的是在於幫助不同層面的社會決策者更好地進行公共決策，以增進民眾的福祉，使民眾享有美好的生活。毫無疑問，這兩種研究取向所討論的問題是密切相關的，但是由於出發點不同，所採用的研

究策略和方法也相差迥異。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大陸學者對幸福的科學研究絕大部分集中在前一種取向，特別是其中與臨床心理相關的研究，國外常常用「與健康有關的生活質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¹加以概括。這一研究方向至今在大陸仍然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但其所涉內容顯然不包括在本文所討論的議題之中。

幸福指數在大陸研究文獻中出現的時間很短，從《中國學術文獻總庫》檢索到的第一篇題名含有幸福指數的文獻是發表在《人口與市場分析》1997 年第 1 期上²，是一篇編譯自美國期刊上的科普類文章，嚴格地講稱不上「研究」。與幸福指數相關度最高的術語「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 在大陸文獻中首次出現是 1980 年，要比「幸福指數」早得多。儘管與「幸福指數」相比，以「生活質量」為題名的文獻大多基於個體微觀角度，但其中不乏社會宏觀層面的研究³。另外兩個與生活質量相關度很高的術語，分別是「滿意感」(life satisfaction)、「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首次在大陸文獻中出現的時間也早於「幸福指數」。為此，本文對大陸幸福指數研究歷程的考察合乎邏輯地向前追溯，宏觀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含滿意感和幸福感研究）也包含其中。分別以「生活質量」、「滿意感」、「幸福感」、「幸福指數」為題名對《中國學術文獻總庫》中的《中國學術期刊網路出版總庫》、《中國學術輯刊全文資料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和《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進行檢索，共得到 1980-2011 年期間屬於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的有效文獻

¹ 「與健康有關的生活質量」經常被定義為：特定的醫療條件或治療對一個人實際的或者所預期的身體、情緒和社會方面良好感受的影響程度，參考 D. F. Cella,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in palliative care," *Seminars in Oncology* 22 (1995): 73-81。

² 這篇題名中含有「幸福指數」文獻標題為〈構建幸福指數〉，編譯自 *American Demographics* (1996) 上的一篇文章。通過對《中國學術文獻總庫》的題名檢索發現，大陸第一篇題名含有「幸福感」的文獻出現在《世界知識》第 13 期（1991）上，標題為〈富裕的日本人缺乏幸福感〉，是一篇科普類文章，介紹的是日本的相關研究。第一篇題名含有「生活質量」的文章發表在《國外社會科學》第 11 期（1980），譯自韓國期刊《政經文化》第 1 期（1980）。

³ 根據文獻檢索分析，題目中含有「生活質量」且屬於社會宏觀層面的研究，大約占到該類文獻總量的 28%（參見表 1）。

4223 篇（表 1）。下面以這些文獻為基礎，對大陸 30 多年幸福指數研究的歷程加以梳理：

表 1 通過題名檢索的歷年發表的幸福指數相關論文統計

發表年份	生活質量	滿意感	幸福感	幸福指數	合計
1980	1 (1)				1 (1)
1981	1 (1)				1 (1)
1982	0				0
1983	2 (2)	1 (1)			3 (3)
1984	1 (1)	0			1 (1)
1985	3 (3)	1 (1)			4 (4)
1986	2 (2)	0			2 (2)
1987	7 (5)	0			7 (5)
1988	7 (3)	1 (0)			8 (3)
1989	9 (8)	1 (0)			10 (8)
1990	18 (6)	1 (1)			19 (7)
1991	18 (7)	1 (1)	1 (1)		20 (9)
1992	26 (12)	0	0		26 (12)
1993	33 (13)	0	1 (0)		34 (13)
1994	55 (18)	2 (2)	0		57 (20)
1995	76 (37)	1 (0)	1 (1)		78 (38)
1996	97 (18)	1 (1)	3 (3)		101 (22)
1997	102 (34)	2 (2)	4 (4)	1 (1)	109 (41)
1998	136 (29)	5 (4)	6 (4)	0	147 (37)
1999	153 (47)	6 (1)	6 (4)	0	165 (52)
2000	217 (43)	1 (0)	6 (5)	0	224 (48)
2001	267 (54)	5 (4)	3 (3)	0	275 (61)
2002	333 (60)	9 (8)	26 (19)	0	368 (87)
2003	485 (75)	14 (6)	54 (33)	1 (0)	554 (114)
2004	672 (80)	7 (4)	56 (38)	6 (3)	741 (125)
2005	868 (119)	18 (11)	100 (77)	17 (16)	1003 (223)
2006	1058 (117)	30 (16)	154 (101)	51 (36)	1293 (270)
2007	1067 (139)	31 (15)	279 (213)	62 (40)	1439 (407)
2008	1187 (128)	26 (9)	371 (322)	69 (52)	1653 (511)
2009	1312 (130)	15 (6)	481 (414)	53 (43)	1861 (593)

發表年份	生活質量	滿意感	幸福感	幸福指數	合計
2010	1631 (144)	16 (6)	546 (466)	79 (50)	2272 (666)
2011	1591 (138)	20 (12)	707 (579)	164 (109)	2482 (838)
合計	11435 (1474)	215 (111)	2805 (2287)	503 (350)	14958(4222)

注：表中的資料是分別以「生活質量」、「滿意感」、「幸福感」、「幸福指數」為題名在《中國學術文獻總庫（1980-2011）》相關資料庫中檢索到的各類文獻的篇數，其中括弧內的資料是排除了個體微觀研究視角以及報導、傳記、書評、資訊等類型的文獻後，真正意義上屬於社會宏觀視角的幸福指數相關研究，占檢索到文獻總量的 28%

（一）引進起步階段（1980-1990）

這一階段的文獻以引介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為主。檢索到的 35 篇文獻中有 20 篇屬這類文獻，或直接譯自國外期刊、或介紹國外研究、或對國外研究加以綜述，涉及到的國家或地區包括美國、（前）蘇聯、英國、（前）聯邦德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澳門等，其中有 7 篇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期刊《國外社會科學》。大陸第一篇以「生活質量」為題的文獻討論的是韓國 80 年代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人口學意義上的社會問題，作者認為其中老齡化和勞資關係問題「同未來的人的生活質量將有密切的聯繫」⁴，儘管沒有查到這篇文獻的引用記錄，但卻有這標誌性意義，從此生活質量問題逐漸引起大陸學界的關注。不僅如此，該文還暗合了後來大陸一度出現的「人口生活質量」的提法。這一階段引用較多的一篇文獻是譯自 *Annual Sociology Review* 的一篇文獻（K.蘇斯耐、G.A.費舍，1987），該文以美國和加拿大 1975-1985 年間生活質量研究的文獻為基礎，對生活質量的含義、測量、理論以及生活質量與公共政策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討論。作者指出「有關生活質量的經驗研究表明，研究內容一直在人們生活的客觀方面（如食物和居住）和主觀方面（如態度和感情）之間徘徊」⁵，但他們顯然站在了美國生活質量研究中一直占主導地位的主觀方面一邊，花費較多篇幅介

⁴ 尹鐘周，〈人口學與生活質量〉，《國外社會科學》第 11 期（1980），頁 49。

⁵ K.蘇斯耐、G.A.費舍著，唐仲勛、葉南客譯，〈「生活質量」的社會學研究〉，《國外社會科學》第 10 期（1987），頁 58-63

紹了生活質量主觀方面的經驗研究和理論進展，該文還提到了美國生活質量研究者坎貝爾等人對生活質量的經典定義「生活幸福的總體感覺」。該定義一段時間內對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大陸研究者對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的研究和探索，是從上世紀 80 年代初開始的。較早的探索可以追溯到 1983 年國家統計局起草的社會統計指標草案風笑天，2007)。⁶1986 年北京市推出的《首都社會發展戰略若干問題研究報告》將生活質量作為評價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包含人均年文娛性消費支出、每萬人口擁有醫院床位數、自由支配時間比率、環境綜合指數等 22 項客觀指標（陶冶，1994）。⁷這一階段最有影響的相關研究是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林南與天津和上海兩家社科院合作完成的。他們的研究主要強調生活滿意感，這一點明顯受到了美國學界更為強調生活質量主觀方面的影響。林南與天津社科院合作採用因素分析法和結構方程模型法，通過測量人們對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和滿意程度，提出了生活質量的結構模型，並採用天津市的調查數據對模型進行了驗證（林南、王玲、潘允康等，1987）。⁸在另外一項研究中，林南和盧漢龍（1989）將生活質量界定為人們對社會環境的滿意程度和對生活的全面評價。⁹一些研究者將側重點放在了客觀指標方面，在著重介紹國外生活質量客觀指標研究的同時，嘗試對大陸客觀生活質量評價的內容和方法進行探討（郭慧珍，1987；王成岐，1989；胡雪萍，1990）。¹⁰按照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設想，1981-1990 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決溫飽問題。這一階段大陸從上到下關注點都在發展經濟，因而與幸福指數密

⁶ 風笑天，〈生活質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顧及相關問題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第 6 期（2007），頁 1-8。

⁷ 陶冶，〈關於生活質量和主觀指標研究〉，《上海綜合經濟》第 9 期（1994），頁 19-21。

⁸ 林南、王玲、潘允康等，〈生活質量的結構與指標〉，《社會學研究》第 6 期（1987），頁 73-89。

⁹ 林南、盧漢龍，〈社會指標與生活質量的結構模型探討〉，《中國社會科學》第 4 期（1989），頁 75-97。

¹⁰ 郭慧珍，〈關於我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探討〉，《經濟科學》第 6 期（1987），頁 78-89；王成岐，〈生活質量測定方法〉，《統計研究》第 2 期（1989），頁 41-45；胡雪萍，〈如何評估我國的生活質量〉，《消費經濟》第 6 期（1990），頁 52-55。

切相關的生活質量主觀方面的研究並未引起決策面的足夠注意。圍繞著各級決策者關注的重點，同時也考慮到資料的可得性和政策的有效性，政府有關部門以及有關政策研究機構更為重視那些能夠體現社會發展的客觀指標。而這種態勢反過來又影響了學界的研究走向。但毫無疑問，這一階段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的引進和探索，深深地影響著大陸今天的幸福指數研究。

（二）探索成長階段（1991-2000）

1991 年以後，大陸學界對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的研究逐漸升溫，通過《中國學術文獻總庫》檢索到 1991-2000 年間相關文獻 292 篇，儘管已接近上個階段的 9 倍，但總量並不大。生活質量客觀方面和主觀方面的研究，沿著各自的方向在不斷推進，一些研究者試圖對這兩個方面加以整合。從文獻類型看，這一階段的文獻涉及到生活質量研究的多個分領域和多個特定群體生活質量的研究，研究者們圍繞著生活質量的概念和評價方法等一些基本的問題進行思考並展開討論，較為深入而系統地瞭解了國外生活質量相關研究的狀況與走勢，出現了以幸福指數為題的文獻。研究者們的探索努力使得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領域在大陸不斷拓展。

按照鄧小平的設想，1991-2000 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二步，目標是到 20 世紀末國內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準達到小康水準。從上世紀 90 年代起，原國家計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統計局和農業部等單位開始對中國小康問題進行細化，各種小康標準逐漸提出，其中生活質量被視為小康評價指標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991 年國家統計局等 12 個部門的研究人員組成了課題組，推出了由 16 個基本檢測和臨測值構成的小康社會指標。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推出了衡量社會發展的社會指標，將生活質量作為評價地區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了由 23 個指標構成的地區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

(朱慶芳, 1992)。¹¹目前全面小康標準仍然是國家統計局和相關政府部門關注的焦點問題。小康指標體系的編制無疑大大增強了社會和決策面對生活質量問題的關注,這類指標的編制基本上沿循的是客觀指標的傳統。在此期間一度產生較大影響的是一批人口經濟學研究者所推動的「人口生活質量」研究(馮立天, 1995a),¹²這類研究對生活質量的界定遵循了國際上主客觀結合的趨勢,但是在具體指標設定時採用的仍然是生活質量的客觀評價指標。一些研究者試圖從全球視角來考察大陸的生活質量狀況,這類用於國際比較的生活質量評價涉及的也是生活質量的客觀方面。朱國宏(1993)採用教育、健康、營養、平等、環境 5 個方面 8 個指標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 9 個國家的生活質量進行了測算。馮立天(1995b)採用所編制的指標體系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 58 個國家和地區的生活質量進行了核算與比較研究。趙彥雲等(2000)編制了包括 9 大類 34 項指標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中國大陸和 40 多個主要國家的生活質量進行了比較研究。地區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也開始出現,一些研究者從客觀方面分別對遼寧營口、吉林、江蘇等地的生活質量進行了量化研究(舒樵, 1991; 歷復魁, 1995; 黃潤龍, 1997)。

生活質量主觀方面的研究在這一階段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明顯滯後於客觀生活質量研究,對決策面的影響也相對較弱。在這個階段出現了一個與主觀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術語「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段建華(1996a)發表在《心理學動態》上的一篇論文從心理學角度梳理了國外的幸福感研究,其中大多著眼於宏觀層面。儘管一些學者對生活質量的主觀方面給予了相當的關注(陳義平, 1993; 陶冶, 1994; 李新家, 1995; 詹天庠、陳義平, 1997),¹³但在這一階段沒

¹¹ 朱慶芳,〈小康社會指標體系及 2000 年目標的綜合評價〉,《中國社會科學》第 1 期(1992),頁 103-120。

¹² 馮立天,〈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研究〉,《人口與經濟》第 6 期(1995),頁 7-14。

¹³ 陳義平,〈兩種生活質量評估方法的比較分析〉,《廣東社會科學》第 3 期(1993),38-45 頁;李新家,〈論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標和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5 期(1995),頁 52-55;詹天庠、陳義平,〈關於生活質量評估的指標與方法〉,《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第 6 期(1997),頁 26-34。

有出現全國範圍的主觀生活質量量化研究。幾項影響較大的量化研究都是針對特定地區的居民，這些研究者主要採用滿意感指標分別對北京、西安、揚州、廈門、武漢等城市居民主觀生活質量進行了調查研究（盧淑華、韋魯英，1991；胡榮，1996；易松國、風笑天，1997）。¹⁴有關幸福感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大學生和老年人等特殊群體（段建華，1996b；劉仁剛、龔耀先，2000；何瑛，2000）。¹⁵

進入 90 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大陸學者主張將生活質量的主觀指標和客觀指標加以結合，以全面反映生活質量狀況。盧淑華和韋魯英（1991）在對北京、西安、揚州三市進行生活質量模式的實證研究中，不僅引入了客觀指標，而且增加了「參照標準對主觀生活質量指標的影響」這個仲介變量，提出了三級主客觀指標作用機制的理論模型。¹⁶葉南客（1992）在對蘇南城鄉居民生活質量進行評估時採用了消費水準、消費結構、生活方式和社會感受 4 類指標，力圖將主客觀指標加以結合。¹⁷李凌江等人（1995）在對湖南省社區居民生活質量進行考察時也試圖將主客觀指標結合，採用了包括軀體功能、心理功能、社會功能和物質生活 4 個維度的生活質量問卷。¹⁸風笑天等人（2000）總結指出，單用主觀指標或單用客觀指標都難以全面地瞭解和測量生活質量的真實狀況，而各種具體的客觀生活質量指標在解釋人們主觀的「滿意度」方面是無能為力的。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結合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大陸學者在上世紀 90 年代所做的探索沒有取得明顯的突破。

¹⁴ 盧淑華、韋魯英，〈生活質量與人口特徵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 期（1991），頁 58-69；胡榮，〈廈門市居民生活質量研究〉，《社會學研究》第 2 期（1996），頁 82-87；易松國、風笑天，〈城市居民主觀生活質量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 期（1997），頁 82-85。

¹⁵ 段建華，〈總體幸福感量表在我國大學生中的試用結果與分析〉，《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第 1 期（1996），頁 56-57；劉仁剛、龔耀先，〈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第 2 期（2000），頁 73-78；何瑛，〈重慶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重慶師專學報》第 2 期（2000），頁 35-38。

¹⁶ 盧淑華、韋魯英，〈生活質量與人口特徵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 期（1991），頁 58-69。

¹⁷ 葉南客，〈蘇南城鄉居民生活質量評估與提高戰略〉，《中國社會科學》第 3 期（1992），頁 135-148。

¹⁸ 李凌江、楊德森、郝偉等，〈社區人群生活質量研究〉，《中國行為醫學科學》第 2 期（1995），頁 58-61。

以上是 1991-2000 年間大陸生活質量研究的主要內容。除此之外，這一階段大陸的生活質量研究也出現了細化的傾向，一些更爲具體的生活質量研究領域開始在文獻中獨立出現，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老年生活質量研究。如前所述，我們檢索到的第一篇以「生活質量」爲題名的文獻就涉及到韓國的老齡化問題。進入 90 年代以後，隨著大陸許多城市老齡化步伐的加快，老年人生活質量引起了研究者更多的關注（葉南客、唐仲勛，1993；潘祖光、王瑞梓，1995；趙細康，1997；張智敏，1999；姜晶梅等，2000）。¹⁹研究者所涉獵的另外一些具體領域包括：婚姻家庭生活質量（盧淑華，1992、易松國、風笑天，1999）、²⁰青年生活質量（葉南客、李芸，1992；吳曉剛，1993）、農民生活質量（陳長華，1993）、文化生活質量（黃志秋，1997）、閒暇生活質量（王雅林、車路光，2000），等等。²¹

與本文議題聯繫最爲緊密的一篇文獻出現在這一階段，那就是《市場與人口分析》1997 年第 1 期刊發的〈構建幸福指數〉。該文編譯自《美國人口統計學》（*American Demographics*）雜誌，原作者 Kacapyr 是一位經濟學者。這不是一篇學術論文，只是一篇介紹該雜誌推出〈美國人口統計學幸福指數〉的短文。這篇文獻爲讀者提供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資訊：（1）現有的經濟發展指標（例 GDP、CPI）不能反映國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程度，而一些用來評價生活質量的其他指標與 GDP 一樣，只

¹⁹ 葉南客、唐仲勛，〈老年生活質量探索〉，《社會科學戰線》第 1 期（1993），頁 130-137；潘祖光、王瑞梓，〈中國老年人口生活質量研究〉，《人口研究》第 3 期（1995），頁 34-40；趙細康，〈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主觀評價分析〉，《人口與經濟》第 6 期（1997），頁 15-20；張智敏，〈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問題〉，《市場與人口分析》第 6 期（1999），頁 36-38；姜晶梅、韓少梅、張孔來，〈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質量綜合評價〉，《中國衛生統計》第 6 期（2000），頁 29-30。

²⁰ 盧淑華，〈中國城市婚姻與家庭生活質量分析〉，《社會學研究》第 4 期（1992），頁 84-91；易松國、風笑天，〈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質量主觀指標結構探討〉，《上海社會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第 1 期（1999），頁 136-144。

²¹ 葉南客、李芸，〈當代青年生活質量的評估〉，《青年研究》第 1 期（1992），頁 22-25；吳曉剛，〈當代青年的工作生活質量〉，《社會科學》第 5 期（1993），頁 44-48；陳長華，〈江蘇農民生活質量評價與比較〉，《江蘇社會科學》第 1 期（1993），頁 113-132；黃志秋，〈論文化生活質量的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第 5 期（1997），頁 17-22；王雅林、車路光，〈非在業群體閒暇生活質量考察〉，《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3 期（2000），頁 89-98。

考慮了國民生活的某個側面；(2) 美國人口統計學幸福指數是一種複合指標，涵蓋了收入和就業機會、生產力和技術、休閒、消費者態度、社會和物質環境等 5 大領域，每個領域都由兩三個要素組成，能夠全面衡量國民的幸福狀況；(3) 該指數從 1990 年 4 月開始測試，以這次測試的數據為基點，記作 100，以後每個月的數據與之比較，就可以反映美國生活質量的走勢；(4) 由於包含了很多價值判斷，測量幸福指數十分艱巨，需要不懈地努力。這篇短文堪稱是普及幸福指數常識的一篇很好材料。²²

(三) 快速發展階段 (2001-2011)

進入新世紀以後大陸宏觀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2001 年是大陸「新三步走」戰略的起始年，隨著小康目標的實現，²³大陸社會財富積累達到了新的水準，但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仍然較大，一些社會問題（例如，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價值缺失等）也突顯出來。社會對生活質量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學界對生活質量的研究也越發深入。在這一階段，生活質量客觀方面的研究出現了明顯的進展，誕生了第一家生活質量研究機構——武漢大學生活質量研究與評價中心，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客觀生活質量評價研究成果，對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明顯增多，發展勢頭甚至超過了客觀生活質量，大陸學者與國外生活質量研究者的聯繫也大大加強。從 2005 年至今，幸福指數成爲大陸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的熱點。

²² 伊里亞·卡派爾，〈構建幸福指數〉，《市場與人口分析》第 1 期（1997），頁 61-62。

²³ 根據鄧小平的估算，人均 GDP 達到 800-1000 美元是中國小康水平的標誌性指標。他提出，到上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 800 至 1000 美元，進入小康社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 68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 732）。2000 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爲 89404 億元人民幣，按照當時的匯率折算人均 GDP 首次超過了 800 美元。「新三步走」戰略在 1997 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首次正式提出，在 2002 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最終形成。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從 2010 年到 2020 年是第二步，到 2020 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比 2000 年翻兩番的目標；從 2020 年到 2050 年是第三步，基本實現現代化。伊里亞·卡派爾，〈構建幸福指數〉，《市場與人口分析》第 1 期（1997），頁 61-62。

2001 年以後大陸生活質量客觀方面的研究不斷深入。周長城等追蹤國內外生活質量研究的最新進展，對大陸客觀生活質量指標構建的理論依據、測量方法、權重分配、專家效度等進行了分析與思考（周長城、吳淑風，2001；周長城、饒權，2001；周長城、袁浩，2002a；周長城、袁浩，2002b）。²⁴彭念一、李麗（2003）構建了包含收入狀況、社會安全、教育狀況、健康狀況、資源與環境、城市環境和社會服務等 8 個子系統 21 類指標構成的生活質量客觀指標體系，並採用該指標體系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 44 個國家的居民生活質量進行測算。²⁵范柏乃（2006）構建了由 30 個指標構成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大陸 31 個省會城市居民客觀生活質量進行了測試。²⁶李正龍（2008）編制了包含收入、消費、居住條件與生活環境、醫療條件、工作機會與社會保障 5 大類 15 項指標的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大陸 31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客觀生活質量進行了測試。²⁷這類研究一般採用專家主觀評定與客觀統計數據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篩選指標，採用加權賦值法確定指標的權重，層次分析、相關分析、因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得到了普遍的運用。

這一時期研究者們對生活質量的主觀方面給予了相當程度的關注（邢占軍，2002；苗元江、余嘉元，2003；王凱、周長城，2004；陳惠雄、劉國珍，2005），主觀生活質量研究發展迅速。²⁸大量的研究針對的

²⁴ 周長城、吳淑風，〈建立人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理論依據〉，《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3 期（2001），頁 381-384；周長城、饒權，〈生活質量測量方法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第 10 期（2001），頁 74-77；周長城、袁浩，〈專家的觀點可靠嗎？對國內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建構問題的探討〉，《社會科學研究》第 1 期（2002），頁 100-106；周長城、袁浩，〈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建構中權重分配的國際視野〉，《江海學刊》第 1 期（2002），頁 94-99。

²⁵ 彭念一、李麗，〈我國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與綜合評價〉，《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5 期（2003），頁 21-25。

²⁶ 范柏乃，〈我國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評價體系的構建與實際測度〉，《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 4 期（2006），頁 122-131。

²⁷ 李正龍，〈居民生活質量的統計分析與綜合評價〉，《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1 期（2008），頁 102-107。

²⁸ 邢占軍，〈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的編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3 期（2002），頁 151-189；苗元江、余嘉元，〈幸福感評估技術發展〉，《中國心理衛生雜誌》第 11 期（2003），頁 786-787；王凱、周長城，〈生活質量研究的新發展：主觀指標的構建與應用〉，《國外社會科學》第 4 期（2004），頁 38-42；陳惠雄、劉國珍，〈快樂指數研究概述〉，《財經論叢》第 3 期（2005），頁 29-36。

仍然是大學生、老年人等特殊群體，研究者採用的工具往往直接來自國外。這種缺憾是顯而易見的，一些研究者嘗試編制適合於中國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評價工具。筆者從體驗論幸福感理論出發，在整合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編制了由 54 個項目組成的「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從知足充裕體驗、心理健康體驗、社會信心體驗、成長進步體驗、目標價值體驗、自我接受體驗、心態平衡體驗、人際適應體驗和家庭氛圍體驗 10 個方面對大陸民眾主觀生活質量加以測量（邢占軍，2002）。陳惠雄、吳麗民（2006）基於快樂感因數圈理論編制了由社會狀況、個體狀況、收入狀況、親情狀況、人際狀況、職業狀況 6 個方面構成的主客觀結合的快樂指數量表。²⁹苗元江等（2009）在整合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基礎上編制了「綜合幸福感問卷」，該問卷包括 1 個指數（幸福指數）、2 個模組（主觀幸福感與心理幸福感）、9 個維度（生活滿意、正性情感、負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關注、利他行為、自我價值、友好關係、人格成長），共 50 個項目。³⁰研究者們還對收入、職業、性別、年齡等與主觀生活質量的關係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實證研究（孫鳳，2007；王秋、邢占軍，2008；羅楚亮，2009；邢占軍，2011）。³¹

第一篇以「幸福指數」為題名的文獻出現在 1997 年，此後長達 6 年的時間裡沒有再檢索到有效的相關文獻。然而從 2005 年開始，幸福指數逐漸成為大陸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的一個熱點。有關幸福指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探討幸福指數的含義、由來、政策功能和現實意義。研究者們從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公共管理學等角度對幸福指數進行了介紹，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劉偉、蔡志洲，

²⁹ 陳惠雄、吳麗民，〈國民快樂指數調查量表設計的理論機理、結構與測量學特性分析〉，《財經論叢》第 5 期（2006），頁 1-7。

³⁰ 苗元江、朱曉紅、陳浩賓，〈從理論到測量：幸福感心理結構研究發展〉，《徐州師範大學學報》第 2 期（2009），頁 128-133。

³¹ 孫鳳，〈性別、職業與主觀幸福感〉，《經濟科學》第 1 期（2007），頁 27-32；王秋、邢占軍，〈年齡與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關係的初步研究〉，《學習與實踐》第 6 期（2008），頁 85-91；羅楚亮，〈絕對收入、相對收入與主觀幸福感〉，《財經研究》第 11 期（2009），頁 79-91；邢占軍，〈我國居民收入與幸福感關係的研究〉，《社會學研究》第 1 期（2011），頁 196-246。

2005；邢占軍，2005b；相子國，2005；姜奇平，2005；沈傑，2006；王俊秀，2006；楊緬坤，2007；左學金，2010），在這類文獻中出現頻率較多的是不丹王國的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和美國行為經濟學家 Kahneman 的幸福研究。³²二是構建幸福指數的指標體系並進行測試與應用。莊連平、李晶（2008）採用相關分析的方法構建了由工作條件、休閒條件、不平等、社會關係、社會福利、心理福利、授權、政治自由、經濟穩定、政治安全、環境條件等 11 個大類構成的廣義幸福指數指標體系。³³王慧紅、陳楠（2008）借鑒英國的幸福星球指數編制了由生活滿意度、預期壽命和生態足跡構成的中國幸福指數，並利用能夠獲得的數據對大陸 31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居民幸福指數進行了核算。³⁴羅四軍、莊成傑（2008）從經濟發展水準、人口與就業結構、人民生活水準和生活環境水準四個方面構建了國民幸福指數評價指標體系，運用變異係數法和距離綜合評價法對大陸 1998-2006 年國民幸福指數進行了測度。³⁵一些研究者則在地區層面上對居民幸福指數進行了測算（吳啓富，2008；林洪等，2011；萬樹，2011）。³⁶

³² 劉偉、蔡志洲，〈經濟增長與幸福指數〉，《人民論壇》第 1 期（2005），頁 39-41；邢占軍，〈談談幸福指數〉，《光明日報》2005 年 12 月 6 日第 5 版；相子國，〈經濟學中的財富與國民幸福指數〉，《民主》第 11 期（2005），頁 16-17；沈傑，〈從 GDP 崇拜到幸福指數關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 3 期（2006），頁 65-70；王俊秀，〈什麼是幸福指數〉，《今日中國論壇》第 11 期（2006），頁 55-58；楊緬坤，〈政府績效評價：公共管理效益指數研究〉，《當代財經》第 9 期（2007），頁 25-29；左學金，〈中國未來發展和幸福指數〉，《社會觀察》第 2 期（2），頁 10-11。

³³ 莊連平、李晶，〈基於相關性分析的廣義國民幸福指數的構建〉，《統計教育》第 8 期（2008），頁 36-40。

³⁴ 王慧紅、陳楠，〈中國幸福指數的構建〉，《商業經濟與管理》第 6 期（2008），頁 74-74。

³⁵ 羅四軍、莊成傑，〈基於距離綜合評價法的我國國民幸福指數 NHI 測評〉，《財經理論與實踐》第 5 期（2008），頁 112-114。

³⁶ 吳啓富，〈北京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編制方法及變動分析〉，《現代商貿工業》第 12 期（2008），頁 117-119；林洪、曲博、溫拓，〈國民幸福理論與廣州國民幸福研究〉，《城市觀察》第 1 期（2011），頁 145-157；萬樹，〈安徽省幸福指數的構建與實證分析〉，《華東經濟管理》第 1 期（2011），頁 24-27。

二、對幸福指數研究中的幾個基礎問題的思考

通過第一部分的梳理，我們可以大致釐清大陸幸福指數研究的來龍去脈以及所關注的議題。經過了 30 多年的發展，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研究雖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一些基礎性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這是導致幸福指數研究難以深入且遠遠不能滿足現實需要的根本原因。本部分就幸福指數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核心概念界定、指標構建方法以及政策功能定位等基礎問題加以探討。

（一）關於幸福指數的概念界定

儘管幸福指數在大陸已經是一個炙手可熱的術語，但當我們深入地考察時卻發現，研究者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卻可能相去甚遠。有研究者認為，國民幸福指數核算的是社會幸福總值，很難用一個像衡量產出水準的 GDP 那樣的指標來加以度量，但是可以用一種傳遞或替代的方法用一些客觀指標對幸福加以間接的計量（藺豐奇，2006）。³⁷有研究者從美國生活質量研究始作俑者 Galbraith 的觀點出發，認為「居民的幸福綜合指數既與本地的經濟發展水準有關，也與居民周圍的生存環境以及公共福祉環境有關，每一方面都只能構成反映居民生活質量高低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真實反映居民的生活質量狀況」（李楨業，2008）。³⁸有研究者受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觀點的影響，從人的自由發展能力擴展的角度理解幸福，認為「基於自由發展視野構建幸福指數體系時，面對的就是擴展人類發展指數的問題」（朱成全、王毅霖，2009）。³⁹以上研究者顯然都是從客觀角度對幸福指數加以界定。另外一些研究者堅持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美國宏觀生活質量研究的主流傳統，從主觀體驗和感受出發對幸

³⁷ 藺豐奇，〈從 GDP 到 GNH：經濟發展價值座標的轉變〉，《人文雜誌》第 6 期（2006），頁 78-84。

³⁸ 李楨業，〈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省級差異〉，《社會科學研究》第 3 期（2008），頁 41-48。

³⁹ 朱成全、王毅霖，〈自由發展視野下幸福指數體系的構建〉，《南京社會科學》第 11 期（2009），頁 97-102。

福指數界定。例如，沈傑（2006）認為「幸福感是人們對生活狀況的一種主觀感受。而幸福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⁴⁰吳啓富（2008）從美國幸福指數研究者 Diener 的觀點出發，認為「主觀幸福感主要是指人們根據自己的價值標準和主觀偏好對於自身生活狀態所做出的滿意程度方面的評價。居民幸福指數就是衡量人們這種感受的主觀指標」。⁴¹還有研究者從主客觀結合的角度界定幸福指數。例如，王慧紅、陳楠（2008）受幸福星球指數研究的影響，從生態的角度對幸福指數加以界定，認為幸福指數是體現「人類幸福生活的生態效應的指標」，⁴²提出了由人均預期壽命和生態足跡⁴³兩個客觀指標以及生活滿意度這個主觀指標構成的幸福指數公式。

筆者最初對幸福指數進行界定主要採用的是主觀視角。認為幸福是與「美好」聯繫在一起的，對它至少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指美好的生活；另一種理解是指人們的主觀感受和體驗。幸福指數所針對的幸福，顯然接近於人們對幸福的後一種理解，也可以稱之為幸福感。幸福感是體現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內容，幸福指數則是反映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邢占軍，2005a）。⁴⁴後來筆者對這種體驗作了進一步說明，提出幸福感是滿意感、快樂感和價值感的有機統一。這個界定被大陸相關研究者較多引用。隨著研究的推進，筆者在界定幸福指數時採用了主客觀結合的視角，對原來的幸福指數定義做了相應的修正，提出「幸福指數是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生活質量反映的是人的存在質量，即在特定社會中人們的各種需要得以滿足的程度和水準，它集中表現為人們所

⁴⁰ 沈傑，〈從 GDP 崇拜到幸福指數關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 3 期（2006），頁 65-70。

⁴¹ 吳啓富，〈北京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編制方法及變動分析〉，《現代商貿工業》第 12 期（2008），117-119。

⁴² 王慧紅、陳楠，〈中國幸福指數的構建〉，《商業經濟與管理》第 6 期（2008），頁 70-74。

⁴³ 生態足跡被認為是一種度量可持續發展的高度綜合的複雜指標。它是衡量在人口與經濟規模條件下，維持資源消費和廢物消納所必需的生物生產面積。

⁴⁴ 邢占軍，〈心理體驗與幸福指數〉，《人民論壇》第 1 期（2005），頁 31-33。

享有的生存與發展方面客觀福利狀況以及所體驗到的幸福感水準(邢占軍、劉珍, 2011)。⁴⁵今天看來,對幸福指數的界定還遠未到位,大陸研究中出現的對概念的界定上的爭議,反映了幸福指數評價內容的複雜性,在特定情況下人們的主觀體驗與客觀條件可能會比較一致,但在更多情況下又可能不盡一致或者很不一致。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國外許多實證材料的驗證(Sirgy & Michalos et. al., 2006)。⁴⁶儘管對生活質量的具體含義存在著諸如條件論、能力論、效用論、體驗論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點已經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認可:幸福指數考察的核心內容是生活質量。如何以生活質量為基礎,進一步就幸福指數界定達成共識,是目前大陸幸福指數研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 關於幸福指數的指標構建

與幸福指數概念界定密切相關的另外一個基礎性問題是評價指標構建,其實指標構建與概念界定很難完全區分開來,一般而言指標構建必然要以概念界定為基礎或者在指標建構的過程中形成概念。但對大陸幸福指數研究進行考察時,卻經常發現一些研究者在構建幸福指數評價指標或指標體系⁴⁷時核心概念缺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指標構建的過程大致包括評價指標的初步提出、指標的篩選、權重的確定以及指標的試用等環節。

與國外幸福指數評價研究類似,大陸比較規範的幸福指數評價研究在指標構建時一般也採用兩種研究視角。一種研究視角基於演繹的邏輯。研究者從特定的理論出發,提出符合該理論的評價指標體系模型,以此為依據編制相應的項目作為備選,然後利用所能獲取的數據資料,

⁴⁵ 邢占軍、劉珍,〈幸福指數與幸福城市建設〉,《中國城市經濟》第1期(2011),頁25-27。

⁴⁶ M. J. Sirgy, A. C. Michalos, A.L. Ferriss et.al.,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6 (2006): 343-466.

⁴⁷ 大陸研究者在最初探討幸福指數時曾介紹過美國 Michigan 大學 Inglehart 教授主持的全球價值研究項目組所採用的單項目幸福感評價指標(劉偉、蔡志洲, 2005),這曾經是美國主觀生活質量研究中一度採用較多的方法,但後來在規範的學術研究中一般很少採用。這種方法仍然被一些研究者或研究機構所採用,但大陸宏觀層面上的幸福指數評價研究者一般不認可這種測量方法。

對假設模型進行擬合度檢驗。根據檢驗的情況，對模型進行修正並增減項目，利用新的數據再對修正後的模型進行檢驗。直到獲得理想的評價指標體系。這種視角屬於典型的概念驅動研究。另一種研究視角則基於歸納的邏輯。研究者首先通過文獻搜集或對質性研究取得的經驗資料的整理，盡可能全面地列出從各個角度體現幸福指數內容的項目作為備選指標，利用所能獲取的數據資料，對項目進行測量學分析與篩選，這個過程一般需要在不同的數據資料支撐下進行多輪，直到選取理想的項目並建構起理想的評價指標體系。這種視角屬於典型的數據驅動研究。就目前來看針對幸福指數指標構建的這兩種研究視角都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從第一種研究視角的相關文獻中，很難發現有說服力的理論依據以及相應的理論假設，當然這與核心概念界定不到位密切相關。不僅如此，對理論模型進行驗證的數據也存在相當的問題。第二種視角下的研究一般著眼於幸福指數主觀指標的構建，但前期的質性研究卻往往不到位，由於幸福指數所考察的內容（特別是其中的主觀內容）明顯受到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程度等因素的影響，缺乏紮實的現場研究必然影響研究的效度。

在指標權重確定方面，有研究者主張對幸福指數指標做等權重處理，但大多數研究者主張進行加權處理。大陸研究者對幸福指數指標進行加權處理的方法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主觀構權，採用最多的是基於專家評價的層次分析法。與德爾菲法相比，這種方法操作起來更為便利，但與德爾菲法一樣專家評價的效度和信度難以得到保證。第二種是客觀構權法，這種方法建立在統計數據或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對數據資料的質量要求很高。常用的統計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回歸係數法、變異數法等。第三種方法是主客觀結合構權法。將指標權重確定分階段進行，在不同的階段分別採用主觀構權或客觀構權方法。在筆者主持的大陸居民幸福指數客觀指標的構建中，採用了一種主客觀結合構權法：層次—主成分分析法。該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用層次分析法對專家評價進行量化分析，確定各個具體指標的初步權重，然後應用主成分分析法

對標準或處理後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利用因素負荷資訊獲得各指標的最終權重（邢占軍等，2011）。⁴⁸這種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專家調查和統計數據（或者居民調查數據）兩種資源，但原有的制約問題仍然存在。筆者認為，要解決好這些問題，一方面要建立穩定可靠的生活質量研究專家隊伍，這些專家可以來自學術界也可以來自實際工作部門，要作為一個統一的項目組長期存在；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計保證統計數據和調查數據的質量。

（三）關於幸福指數的政策功能

第三個需要討論的基礎問題是幸福指數的政策功能。大陸剛開始關注幸福指數之時，曾經有過對幸福指數研究是否超前的質疑，到目前為止，大陸學術界對幸福指數的研究價值幾乎已經沒有什麼爭議了。但是，對於幸福指數可以發揮怎樣的政策功能卻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爭議的焦點之一是幸福指數是否可用作政績考核指標。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大陸對各級政府的考核以 GDP 為導向，這種導向的弊端已經越來越明顯。幸福指數引入後，有人力主將幸福指數作為考核政績的指標，認為「只有當它正式成為考核政府政績的參考指標時，才能發揮應有的指揮棒作用」（余元洲，2006）。⁴⁹也有學者明確反對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績考核的指標，認為幸福指數研究不僅缺乏理論和方法論基礎，而且其自身的特點也決定了不宜作為政績考核指標（楊緬坤，2007）。其實從國際上看，近年來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決策者都明確提出要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導向，然而迄今為止學界對幸福指數政策功能的探討卻並不到位。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幸福指數指標大致可以發揮以下三種政策功能：一是目標導向功能。作為一種政策分析工具，幸福指數指標可以體現人類社會發展終極目標的實現程度，彰顯了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

⁴⁸ 邢占軍等，《公共政策導向的生活質量評價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

⁴⁹ 余元洲，〈以幸福指數做政績考核指標有何不宜〉，《學習月刊》第11期（2006），頁35-36。

政策理念，是對經濟增長中人的價值的肯定，可以改變以往發展中存在的「見物不見人」的偏向。特別是指標設計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目的性，為更高水準的幸福社會建設提供目標導向。在發揮目標導向功能作用時，應當特別注意主觀指標與客觀指標可能存在相背離的情況，找到改善民眾客觀生存發展條件和提升民眾幸福感的最佳結合點。二是監測診斷功能。與 GDP 指標不同，幸福指數指標更多發揮的是診斷功能。幸福指數的著眼點不在於指示特定社會已經達到了多麼幸福的水準，而是要診斷特定社會在發展的進程中，有哪些因素可能會偏離民眾的期待、削弱民眾的幸福。我們可以通過幸福指數對幸福社會目標實現的程度進行有效監測，診斷在推進幸福社會建設中可能存在的各種問題，並為相應的公共政策調整提供科學的依據。三是考核評價功能。儘管近年來 GDP 作為政績考評工具在各國遭到了普遍的質疑，但幸福指數指標卻不太可能完全取代 GDP 等指標，應當將其與 GDP 等指標相互補充。在用作政績考評工具時，必須對 GDP 與幸福指數的功能與作用加以區分。一般而言，幸福指數指標、特別是幸福感指標更適宜用作約束性指標，不能不切實際地追求幸福指數的增長率。應當警惕「幸福陷阱」的存在，即因民眾需求層次的改變，幸福指數不隨 GDP 等指標的增長而同步增長，甚至可能出現暫時的下降。

參考書目

- 王成岐，1989，〈生活質量測定方法〉，《統計研究》第 2 期，頁 41-45。
- 王秋、邢占軍，2008，〈年齡與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關係的初步研究〉，《學習與實踐》第 6 期，頁 85-91。
- 王俊秀，2006，〈什麼是幸福指數〉，《今日中國論壇》第 11 期，頁 55-58。
- 王凱、周長城，2004，〈生活質量研究的新發展：主觀指標的構建與應用〉，《國外社會科學》第 4 期，頁 38-42。

- 王雅林、車路光，2000，〈非在業群體閒暇生活質量考察〉，《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頁89-98。
- 王慧紅、陳楠，2008，〈中國幸福指數的構建〉，《商業經濟與管理》第6期，頁74-7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4，《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左學金，2010，〈中國未來發展和幸福指數〉，《社會觀察》第2期，頁10-11。
- 朱成全、王毅霖，2009，〈自由發展視野下幸福指數體系的構建〉，《南京社會科學》第11期，頁97-102。
- 朱國宏，1993，〈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問題初探〉，《經濟學家》第2期，頁98-106。
- 朱慶芳，1992，〈小康社會指標體系及2000年目標的綜合評價〉，《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頁103-120。
- 李凌江、楊德森、郝偉等，1995，〈社區人群生活質量研究〉，《中國行為醫學科學》第2期，頁58-61。
- 李新家，1995，〈論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標和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頁52-55。
- 李楨業，2008，〈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省級差異〉，《社會科學研究》第3期，頁41-48。
- 李正龍，2008，〈居民生活質量的統計分析與綜合評價〉，《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第1期，頁102-107。
- 余元洲，2006，〈以幸福指數做政績考核指標有何不宜〉，《學習月刊》第11期，頁35-36。
- 沈傑，2006，〈從GDP崇拜到幸福指數關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3期，頁65-70。
- 何瑛，2000，〈重慶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重慶師專學報》第2期，頁35-38。

- 邢占軍，2002，〈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的編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3 期，頁 151-189。
- 邢占軍，2005a，〈心理體驗與幸福指數〉，《人民論壇》第 1 期，頁 31-33。
- 邢占軍，2005b，〈談談幸福指數〉，《光明日報》12 月 6 日第 5 版。
- 邢占軍，2011，〈我國居民收入與幸福感關係的研究〉，《社會學研究》第 1 期，頁 196-246。
- 邢占軍、劉珍，2011，〈幸福指數與幸福城市建設〉，《中國城市經濟》第 1 期，頁 25-27。
- 邢占軍等，2011，《公共政策導向的生活質量評價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 林洪、曲博、溫拓，2011，〈國民幸福理論與廣州國民幸福研究〉，《城市觀察》第 1 期，頁 145-157。
- 林南、王玲、潘允康等，1987，〈生活質量的結構與指標〉，《社會學研究》第 6 期，頁 73-89。
- 林南、盧漢龍，1989，〈社會指標與生活質量的結構模型探討〉，《中國社會科學》第 4 期，頁 75-97。
- 周長城、吳淑風，2001，〈建立人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理論依據〉，《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3 期，頁 381-384。
- 周長城、饒權，2001，〈生活質量測量方法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第 10 期，頁 74-77。
- 周長城、袁浩，2002a，〈專家的觀點可靠嗎？對國內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建構問題的探討〉，《社會科學研究》第 1 期，頁 100-106。
- 周長城、袁浩，2002b，〈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建構中權重分配的國際視野〉，《江海學刊》第 1 期，頁 94-99。
- 吳啓富，2008，〈北京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編制方法及變動分析〉，《現代商貿工業》第 12 期，頁 117-119。
- 吳曉剛，1993，〈當代青年的工作生活質量〉，《社會科學》第 5 期，頁 44-48。

- 易松國、風笑天，1997，〈城市居民主觀生活質量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頁82-85。
- 易松國、風笑天，1999，〈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結構探討〉，《上海社會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第1期，頁136-144。
- 風笑天，2007，〈生活質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顧及相關問題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第6期，頁1-8。
- 姜奇平，2005，〈國民幸福指數的測度——如何量化“人民滿意不滿意”程度〉，《互聯網周刊》第8期（2005），頁54-56。
- 胡雪萍，1990，〈如何評估我國的生活質量〉，《消費經濟》第6期，頁52-55。
- 胡榮，1996，〈廈門市居民生活質量研究〉，《社會學研究》第2期，頁82-87。
- 苗元江、余嘉元，2003，〈幸福感評估技術發展〉，《中國心理衛生雜誌》第11期，頁786-787。
- 苗元江、朱曉紅、陳浩賓，2009，〈從理論到測量：幸福感心理結構研究發展〉，《徐州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頁128-133。
- 相子國，2005，〈經濟學中的財富與國民幸福指數〉，《民主》第11期，頁16-17。
- 范柏乃，2006，〈我國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評價體系的構建與實際測度〉，《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4期，頁122-131。
- 段建華，1996a，〈主觀幸福感概述〉，《心理學動態》第1期，頁46-51。
- 段建華，1996b，〈總體幸福感量表在我國大學生中的試用結果與分析〉，《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第1期，頁56-57。
- 張智敏，1999，〈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問題〉，《市場與人口分析》第6期，頁36-38。
- 孫鳳，2007，〈性別、職業與主觀幸福感〉，《經濟科學》第1期，頁27-32。
- 姜晶梅、韓少梅、張孔來，2000，〈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質量綜合評價〉，《中國衛生統計》第6期，頁29-30。

- 陶冶，1994，〈關於生活質量和主觀指標研究〉，《上海綜合經濟》第 9 期，頁 19-21。
- 莊連平、李晶，2008，〈基於相關性分析的廣義國民幸福指數的構建〉，《統計教育》第 8 期，頁 36-40。
- 葉南客，1992，〈蘇南城鄉居民生活質量評估與提高戰略〉，《中國社會科學》第 3 期，頁 135-148。
- 葉南客、李芸，1992，〈當代青年生活質量的評估〉，《青年研究》第 1 期，頁 22-25。
- 葉南客、唐仲勛，1993，〈老年生活質量探索〉，《社會科學戰線》第 1 期，頁 130-137。
- 黃潤龍，1997，〈江蘇人民生活質量的比較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1 期，頁 6-17。
- 黃志秋，1997，〈論文化生活質量的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第 5 期，頁 17-22。
- 郭慧珍，1987，〈關於我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探討〉，《經濟科學》第 6 期，頁 78-89。
- 陳長華，1993，〈江蘇農民生活質量評價與比較〉，《江蘇社會科學》第 1 期，頁 113-132。
- 陳惠雄、劉國珍，2005，〈快樂指數研究概述〉，《財經論叢》第 3 期，頁 29-36。
- 陳惠雄、吳麗民，2006，〈國民快樂指數調查量表設計的理論機理、結構與測量學特性分析〉，《財經論叢》第 5 期，頁 1-7。
- 陳義平，1993，〈兩種生活質量評估方法的比較分析〉，《廣東社會科學》第 3 期，38-45 頁。
- 馮立天，1995a，〈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研究〉，《人口與經濟》第 6 期，頁 7-14。
- 馮立天，1995b，〈中國人口生活質量與國際比較〉，《人口學刊》第 6 期，頁 3-15。

- 舒樵，1991，〈營口市居民生活質量調查〉，《社會科學輯刊》第3期，頁31-40。
- 彭念一、李麗，2003，〈我國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與綜合評價〉，《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第5期，頁21-25。
- 詹天庠、陳義平，1997，〈關於生活質量評估的指標與方法〉，《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第6期，頁26-34。
- 萬樹，2011，〈安徽省幸福指數的構建與實證分析〉，《華東經濟管理》第1期，頁24-27。
- 楊緬坤，2007，〈政府績效評價：公共管理效益指數研究〉，《當代財經》第9期，頁25-29。
- 趙細康，1997，〈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主觀評價分析〉，《人口與經濟》第6期，頁15-20。
- 趙彥雲、李靜萍，2000，〈中國生活質量評價、分析與預測〉，《管理世界》第3期，頁32-40。
- 潘祖光、王瑞梓，1995，〈中國老年人口生活質量研究〉，《人口研究》第3期，頁34-40。
- 劉仁剛、龔耀先，2000，〈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第2期，頁73-78。
- 劉偉、蔡志洲，2005，〈經濟增長與幸福指數〉，《人民論壇》第1期，頁39-41。
- 盧淑華、韋魯英，1991，〈生活質量與人口特徵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頁58-69。
- 盧淑華，1992，〈中國城市婚姻與家庭生活質量分析〉，《社會學研究》第4期，頁84-91。
- 歷復魁，1995，〈吉林省社會生活質量的預測與分析〉，《人口學刊》第6期，頁47-59。
- 韓淑麗，1992，〈城鎮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財經問題研究》第5期，頁55-59。

- 羅四軍、莊成傑，2008，〈基於距離綜合評價法的我國國民幸福指數 NHI 測評〉，《財經理論與實踐》第 5 期，頁 112-114。
- 羅楚亮，2009，〈絕對收入、相對收入與主觀幸福感〉，《財經研究》第 11 期，頁 79-91。
- 藺豐奇，2006，〈從 GDP 到 GNH：經濟發展價值座標的轉變〉，《人文雜誌》第 6 期，頁 78-84。
- Cella, D. F., 1995,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in palliative care," *Seminars in Oncology* 22: 73-81.
- Sirgy, M. J., Michalos, A. C., Ferriss, A. L. et.al., 2006,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6: 343-466.
- 伊里亞·卡派爾，1997，〈構建幸福指數〉，《市場與人口分析》第 1 期，頁 61-62。
- 尹鐘周，1980，〈人口學與生活質量〉，《國外社會科學》第 11 期，頁 49。
- K.蘇斯耐、G.A.費舍著，唐仲勛、葉南客譯，1987，〈「生活質量」的社會學研究〉，《國外社會科學》第 10 期，頁 58-63。

To Explore the Quality of Life from a Macro Point of View: A Review on the Well-Being Index Study in Mainland China

Zhanjun Xing^{*}

Abstract

Since the mid-1950s of the last century,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at the macro level rise and gradually into the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1980s, researchers from mainland China began to explore quality of life at macro level.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and especially since 2006, the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The well-being index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 the media and the policymakers. Based on examining the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at macro level in mainland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well-being index, its measurement and policy functions, and think about some concerned problems in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quality of life, well-being index, subjective well-being,
public policy**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Shandong University, Professor